

## 写在《古代希腊哲学新论》前面

□叶秀山

马克思说过，希腊古典艺术有“永恒的魅力”，我觉得希腊的古典哲学也有“永恒的魅力”，大概一切称得上“古典”的东西，都有“永恒的魅力”。

“魅力”是一种“吸引力”，你只要一旦“接触”它，一旦“遭遇”它，你就会被它“吸引”住；地无分东西，时无分古今，都能保持这种“吸引力”，也就是具有“永恒的魅力”。

为什么会有这种“魅力”？大概和我们人类是一种“历史性—时间性”的生物有关。猿猴或许只对对它当下“有用”的东西“感兴趣”，而我们人类原则上却对“一切”都会“感兴趣”。感不感“兴趣”，一方面取决于“对象”的特点和性质，一方面更主要的还在于吾人自身的素质条件，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趣味，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趣味，“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但是高度文明的人类，对于古代一砖一瓦都可以珍藏，有时还可“拍卖”，何况是古代哲学智慧的结晶？

思想的产品与物质的产品确有不同。人们对于物质产品的兴趣除了使用的价值外，也有思想的因素在内，但是那是在物质外壳蕴藏下的一种思想意义；而思想的产品，如艺术、文学和哲学的产品，则是直接将“思想”呈献在世人面前，令人思考，令人吟诵。

也有主张将“思想产品”当做“物质产品”来看的，如福科那样，认为一切“文献”都要做“文物”观，历史要做考古观，柏拉图的《对话》也须得当做古代希腊社会考古层面的“文物—档案”来研究。这是一种很深刻的哲学观念，值得我们做哲学史的重视，将柏拉图《对话》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当时种种“事件—事物”中的一件“事”来看，其具体意义当然就更加明白了。

我们做哲学史的要有一层基础的功夫，对于思想的产品，要有当时社会背景的具体环境方面的知识，而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做希腊哲学以及扩大开来做欧洲哲学，是相当困难的，有许多似乎跟“哲学”没有关系的事情要做。

譬如语言这一关就很难。

我没有正规的古希腊语的训练，是一个很非常的时代和很偶然的的机会，自学了一点，也只是“初识之无”；不过还是很认真地学的，我也对哲学的语言问题有较多的兴趣，当时尚不知道海德格尔有“语言是存在的家”之说也。

我尝想，“哲学”是“专业名词”最少的学科，自造一些生冷的名词，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多采用日常的语言最常用最基本的字，而赋予其哲学的含义，譬如海德格尔的“Sein-Dasein”，大概德文中这个词的“使用率”是最高的了。我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词汇也会是这样的，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当然是日常语言转化而来，犹如海德格尔的“Sein”，柏拉图的“idée”我想应该也会有这种情形，就此做了一些“考证”，当然很肤浅，不能满意的；不过我相信，这个路子做下去还是有意义的，我甚至买了阿里斯多芬的全部希腊文戏剧作品来，计划好好读读，因为我感到“悲剧”语言经过作者加工的成分多，而“喜剧”语言，是最为贴近生活的，从中也许可以发现点什么，可惜这件事一忙就给挤掉了，那套全集也就只得束之高阁了。

这里也说明，我不认为“哲学”要“制造”什么“自己”的“专业名词”，甚至“哲学”工作就是要“造”一些“名词”才算上乘；恰恰相反，“哲学”既然是最为“基础”的学问，它用的“词汇”，也是“最基础”的，不需要“造”什么“新”“词汇”，“哲学”是用“最基本”的“词汇”，说“最基本”的道理。不错，德罗兹说“哲学”要“创造概念”，但他的意思绝不是说“造”一些“词汇”就是“哲学”了，要是这样，那么新词“粉丝”、“忽悠”等等，就会是最流行的“哲学”语言了。德罗兹的“概念”和“创造”，当有他自己的哲学意思，不是可以想当然地比附出来的。

这项从大的社会背景——从“文物”角度研究古代希腊哲学的工作，主要表现在我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本《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里，那是一本资料性的书，把历史背景思想脉络梳理了一下，谈不到思想的深入。

不久我去美国进修，原本也想学希腊哲学，但是看到那浩如烟海的资料，我感到，要想做到福科那种要求“深入细节”的历史把握，此生休矣，若不改弦更张，将会一事无成。渐渐地我将自己的“兴趣”转向“哲学”“思想”的方面。

和一切“事物”一样，“哲学”在自身的“思想”方面也有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多年来我感到“哲学”这个“成熟”期在“德国古典哲学”即“从康德到黑格尔”这个阶段，很长时期以来，我的阅读、写作—研究的重点在这个阶段。

就我自己的体会说，我感到这一段的工作，对于古希腊哲学的理解，是很有帮助的；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功夫”在“古希腊哲学”之外，“希腊哲学”的理解，在“非希腊”。这里（指即将收纳于万俊人主编“清华人文丛书”的《古代希腊哲学新论》——编者）收集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和《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两本书之后的文章，都是以“非希腊”来研究“希腊”的产物。如果这一段的工作对于“希腊哲学研究”还有些价值的话，或许是“非希腊”反倒“更希腊”。

“哲学”就是这样一门很奇特的学问，它是“后人”把“前人”想说而没有说清楚的话”说了出来。我始终觉得胡塞尔自称他把柏拉图想说而没有说清楚的话说得更清楚了，这个意思很好。“非希腊”把“希腊”哲人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说”出来了。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无不如是。

这个“非希腊”范围很广，也包括中国的深厚的哲学传统，这个集子里也收了我在这方面

的一点尝试，当然也还是很肤浅的。

这里又涉及福科的一个思想。他认为“实物”在实际上是“连续”的，而“思想”反倒是“断裂”的，这对于“哲学史”的传统，的确是一种“反潮流”精神，在强调“思想”之“独创—个性—自由”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我们讲“思（想）”之“历史性”，并不和“思（想）”之“独立—自由”相排斥，因为我们理解的“历史性”恰恰也还是“自由—具体—独特”的。并不是“历史”是“连”的，“思想”是“断”的；而是要“连”都“连”，要“断”都“断”的。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问题。包括福科在内的法国诸子，将“时间”“拉回”到“空间”中来，而“断裂”“时间”之“绵延”，从而认为柏格森哲学已经落伍；但是“哲学史”表明，或者全部“历史”表明：不仅“空间”可以“吸收”“时间”，使“时间”“断裂”，而且“时间”也可以一有能力“吸收”“空间”，使“空间”“连续”。“在”“历史”“中”的“空间”，当是“连”中之“断”。“哲学—思想”即使作“事件”观，也“在”“时间”中，它的“空间”“在”“时间”中。

“哲学—思想”为“连”中之“断”，是“绵延”中之“断裂”，是“必然”中的“自由”，是“承续”的“独创”，也是“独创”的“承续”。

“哲学—思想”为“是”中之“非”，也是“非”中之“是”；“希腊”“在”“非希腊”中，“非希腊”也“在”“希腊”中。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可以“互”“看”，因为他们可以“互”“在”。也就是说，我们在康德等人著作中可以“看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甚至也可以看到康德等人的“问题—思想”，但他们又都是具有“独创性”的，又都是“独立”的，只是他们的“独立”已经被“时间”“吸收”了，他们都只有“在”“时间”中才有“空间”。

“古人”与“今人”之所以可以一有能力“互在一互看”，乃在于就哲学问题来说，他们“同在”。就“空间”化了的“时间”来说，古人和今人绝不“同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纪元前”，而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则在“纪元后”18、19、20世纪，相隔两千多年；但是就“时间”之“绵延”说，他们在“同一”个“时间”“绵延”中，“前人—古人”“会”一有能力“想到”“以后”的“事—问题”，“后人—今人”当然也“会”一有能力“想思考”“以前”的“事—问题”。“古人”与“今人”“会”一有能力—可以“相互”“理解”。

当然，我们不能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已经“知道”后世会出康德、黑格尔，哲学家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仙”，对于“后世”“空间”中“发生”的“事”，不能“计算—推论”出来；但是哲学家却是有能力—可以甚至应该“思考—预料”到“后世”“思想”发展的“可能性”。哲学家不能“推算”出“后世”之“空间”中“诸存在者”，但却应该有能力“把握”“时间”之“存在”。对于“存在”的“理解”，乃是“哲学家”的“当行—本行”。

我们正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说“古今哲学”“同在”。“同在”不是“超越”“时空”，不是在一种“抽象”意义上讲的，“同在”恰恰是“在”“时空”“中”，“在”“时间—绵延”“中”，“在”“历史”“中”，“在”“同一条历史长河”“中”。

或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竟已是“古人”，他们早已“故去”——“死”了。诚然他们都已“逝世”两千多年，“人死不能复生”，“时间”不能“倒流”，何以能够与“今人”“同在”？

这时，我们想起了从柏拉图《非多》篇引发的那段关于“死”的议论。这段意思，不可以仅仅从一种“豁达—洒脱”的品质上去理解，而确实确实是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哲学萦绕于这个“死”的问题也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基础还是柏拉图—苏格拉底打下的：“死”“摆脱”“肉体”之“羁绊”，使“灵魂”可以“自由”地与“古人”交往。

苏格拉底—柏拉图这里已经涉及“古今”“同在”的问题，只是哲学之“思”运行两千年到了海德格尔，随着“时间”和“存在—历史”问题的深入哲学“本体论”，“死”的问题也得到进一步深化。

“死”——“人”之“死”，不是“(泯)灭”，“死”是“存在”的一种方式，“无”是“有”的一种方式；“人”“死而不亡”。“断”是“连”的一种方式，“死”仍在“绵延”中，“死”是“时间”性的，而不仅仅是“空间”性的。“死”将“空间”“吸收”到“时间”中来，使“人”“载入史册”，使“人”的“世界”“进入”“历史”。

古代希腊给“人”的“定位”为“会死的”；海德格尔对于“人”之“死”进一步发挥为只有“人”“有能力”“死”，即只有“人”“有能力—能够”“想”到“生前”“死后”，“人”之“死”“超越”“死”之“断”，进入“时间”之“绵延”，尼采谓之“超人”。

回到柏拉图—苏格拉底论“死”。“死”作为“存在”的方式，“死”即是“思”，“死”使“思”“纯净化”，使得“思”摆脱“诸存在者”的“关系”，摆脱“声色货利”，“死”“净化”“思”，“死”使“思”“存在”。

“哲学家”作为对于“思—死”之“觉醒者”，比较“自觉”地使自己的“思”“纯净”起来，而勇敢积极地理解“死”。哲学家“虽死犹生”，“置之死地而后生”。“哲学家”努力“争取”与“古今”“同在”，与“后辈”“共同”“进入”“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永远”“面向—有”“未来”。

然而，又何谓“哲学家”？是因为写了“哲学著作”使“作者”成为“哲学家”，还是“哲学家”写了“著作”使“著作”成为“哲学著作”？这里套用了海德格尔《论艺术的本原》一文中的提问方式，他在解决到底是“艺术家”使“作品”成为“艺术品”，还是“艺术作品”使“作者”成为“艺术家”这个争论时提出一个“第三者”——“艺术”，是“艺术”使“作品”成为“艺术品”，也使“作者”成为“艺术家”，这样，我们也可以说，“哲学家”与“哲学著作”之“上”还有一个“哲学”（第三者）“在”。

“哲学家”和“哲学著作”都是“存在者”，而“哲学”是“存在”。“哲学家”是“做”“哲学”的，“哲学著作”是“说”“哲学”的，“哲学家”的“做”，也是“说”，“语言”为“存在”的“家”，“哲学著作”里“住”着“哲学家”。“哲学家”和“哲学著作”的“命运”随“哲学”的“命运”而“转移”。“哲学”的“命运”，“决定”“哲学家—哲学著作”的“命运”。“存在”“决定”“存在者”的“意义”。

“哲学”有着自己“兴衰”的“坎坷”“历史”；然而“哲学”“存在”，“哲学”不可

能被“遗忘”，就如“人”不会被“遗忘”一样。“人”不因为“有死”而“泯灭”；“哲学”也不因为“式微”而“消亡”。“哲学”或会“让位”给其他什么，所谓“哲学”“边缘化”，而“位”、“边缘”都是“空间”的特性，“哲学”为“时间”的，“让位”和“边缘化”皆无妨其“本质”，无妨其“存在”。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好像“哲学”恰恰就是一场“不散”的“筵席”。“哲学”是一个“盛会”，是一场“古今”“国际”“大会”。“地无分东西”、“时无分古今”，“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贤”是必须的，柏拉图的“学园”上写得明白，“非贤（在柏拉图是指懂数学的）莫入”；“长”可“长”到纪元之前，“少”可“少”到“尚未”“出生”的“未来”。“哲学”这个“家”的“大门”永远为“贤哲”“开放”。

此处所谓“贤哲”，并非特殊“职称”，而是泛指“聪明人”，凡对哲学问题有思考、有悟性的，皆得“入门”，在这个意义上，可谓“人人得而为圣贤”；只是“哲学”从古代希腊算起，也有两千多年发展历程，也积累了很多“经典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专业性”，读这些著作，乃是“学习”前人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经验”的唯一途径，“哲人”“已逝”，“著作”“长存”——“哲学家”“住（留）在”他的“著作”中，要和他交往，非通过“读”他的“著作”不可。

“人”“哲学”之“门”，与“古贤哲”“交往”，也就是“读”他们的“书”。也有那不提倡读书而学哲学的，我们已经讨论过多次；此处想补充的是：劝人不要读书而“直接”“想”“哲学问题”的，事实上自己却不断地写书，于是就由“言行不一”走向“表里不一”。

“不读书”固有“理”兮，天下“第一本书”并非“读书”“读”出来的，而“哲学”不是要“做”那“第一”的“事”吗？的确，“哲学”不作“第二人语”，“哲学”是“创造性”的学问；只是“创造性”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做的，你在做，他也在做，今人做，古人也做，“做”“创造性”的“事情”也有个“交流”，看看“别人—他人—古人”是“怎样”“创造”的，也会“估计”到“后人”会怎样“创造”。这个“第一”不是“唯一”，“哲学家”不是“一神教”的“神”，“第一”是“多”；于是“第一者—创造者—自由者”乃是“多”，古代希腊的“一”与“多”的问题，在“哲学”上得到“统一”。

“第一者—创造者—自由者”为“多”，于是也有个“关系”问题：“诸创造者—诸第一者—诸自由者”之间是何种“关系”？他们不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康德说过，唯有“人”不能作为“手段”来“被”“使用”，“人”只能是“目的”。对于古代贤哲的著作更加如此。

当然“读书”自是“充实”“自己”，但是并不“消耗”“对方”，“读书”是世上唯一的“利己”而“不损人”的“事情”，也就是“读书”是一种“存在”的关系，而不是“存在者”的关系，是“时间”的关系，而不是“空间”的关系。“空间”有“物不人”性，“我”“来”了，“你”就得“让位”，不“让”就得“被”“我”吃掉；而未曾听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已经“让位”于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也不能“替代”康德、黑格尔。

或谓“读书”是为“六经注我”，“六经”皆为“我”“用”。如果将“六经”当做“手段”来“用”，则且不说有违康德的意思，“对不起”那“住”“在”里面的“古人”，同时

也令人产生一个疑问，所谓的“我”又从何来？“我”不又是“离不开”包括“六经”的“培育”吗？果真将“养育”之“恩”都拿来做了“手段”“为我所用”，是不是太“自我中心”了点？或者这个“我”已经有了那从别处“邈来”的“条条框框”，把“六经”的意思往那些“条条框框”里填塞，似乎也难说学问之道。

于是尚有“我注六经”的说法管着，这个说法采取了与上述“六经注我”相颠倒的方法，实际仍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无非谦虚点，把“我”当做了“手段”，“我”只是“替圣人立言”。

做别的学问暂且不论，这两种方法态度都不适用于“哲学”。

“哲学”是“自由”的学问，“哲学家”之间是“自由者”之间的关系。

“哲学”是一个聚“古今”“哲学家”于一堂的“盛会-盛宴”，也“开放”于一切“未来”的“哲学家”，为他们“留有余地”。“哲学家”和“哲学作品”都“住在”“哲学”中，“住在”“时间”“绵延”中。

“盛宴”当有“醇酒—美酒”，“哲学”的“精神”，就是这种“酒神精神”，“酒神精神”是“自由的精神”，“自由”到“地不分东西一时不分古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对于“空间”和“空间性时间”言，它是“醉”了，“颠倒”了“时序—方位”，但就“时间”之“绵延”言，它并未“醉”，“哲学”“沟通—会通”“古今—中外”，与“古人—时人—后人”“交往”。

“酒”对人的精神—身体当也是一种“考验”，“哲学”也提醒人们世事之艰难困苦，但毕竟“未来”总是一个“希望”，“哲学”提供“未来”这种“可能性”之“必然性”论据。固然“借酒浇愁愁更愁”，但毕竟“杜康”能“忘忧”。“忘掉”“眼前”“烟云”，“进入”“时间”，进入“历史”，进入“未来”，“风物长宜放眼量”。

“哲学”这个“盛宴”从古代希腊开始，一直到“现在”并未“散”，而且可以“推断”，“今后”还会以种种形式“开”下去。

参加这个“盛宴”，不需要什么“外在”的“资格”，但倒也需要有一张“请柬”，不过这张“请柬”并非“他人”发给的，而就在每个人自己手里；只是许多人并不“认识—识得”这张“请柬”而已。

人人手里都有“哲学”“门”的“入场券”，请大家珍惜它，殊不知“哲学”一直在“邀请”你参加它的“盛宴”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